

# 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



湖北人民出版社 何錫章



何锡章

# 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

鄂新登字 01 号

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

何锡章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75 印张 1 插页 234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170

ISBN 7—216—01814—1  
B·90 定价:12.80 元

# 序

陆耀东

锡章同志到华中理工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我们就相识了。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坦率、真诚、好学。我有一个偏见，愿结交以诚相见的朋友。原因很简单，觉得在熟人之间，需时时存有戒心，如《贤文》所说“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既不愿也难以做到。对于城府甚深者或敬而远之，或探悉其深处再定态度。我以为锡章君是可以作为朋友待之的。他不时来叙叙，每有所作，也必赠我一份。这次，他将《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思想探求》校样送来，嘱我写几句话。于是，欣然涂下一点随感。

这是我很感兴趣而又未曾深入研究的课题。对此，早在清末民初就有智者关注，“五四”时期，许多

思想家、文学家发表了见解；“五四”后近八十年内，有一段时间，除了伴随着大批判，学术界不能触及人性，论者多遭厄运。只有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场浩劫之后，人们才又重新研究它。其实，这是一个涉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是与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有关的问题。既有人类这一有别于其他动物的类，自然有人性；正如同既有民族差别，自然就有民族性，有国别，自然就有国民性，有阶级之分，就有阶级性。在人身上，人性、国民性、民族性、阶级性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并非只有某一性，也并非互相绝对排斥。如果将其中任何一“性”绝对化，将它视为排它性的唯一存在，就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和可怕的后果。“文革”中将阶级性、阶级对立极端夸大，个别地方出现了无端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兽性行为，即是一例。

锡章君的这部专著，着重从“生存与发展”、“客体与主体”、“群体与个体”、“经验与理性”、“静态与动态”、“封闭与开放”等方面探寻中国现代理想人性，著者吸收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的有关思想资料，研究中力避浮躁和偏激，较细致深入地辩证地论析，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性，向生存、客体、群体、经验、静态一方严重倾斜，而发展、主体、个体、理性、动态则被封闭在次要的位置上。我以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著者在谈论中国传统人性时，意在寻觅中国现代理想人性，目的在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这里，我请求读者注意一个问

题，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泱泱大国而近代备受外国欺凌目前也尚不富强的国家的国民，我们应有一种现代人的心态：对于指出我国传统和现实人性弱点和弊病的人，应像对肯定我国传统和现实人性优点的论者一样持欢迎态度。且不说批评者中不乏真爱我者，肯定者中不能排除别有用心者。我们对自己当有自知之明，当有自信乃至确信。鲁迅先生对老朋友内山完造写的《活中国的姿态》的第一条意见就是：“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sup>①</sup>在逝世前不久，鲁迅先生致尤炳圻信说：“我们生于大陆，……，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sup>②</sup>他还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sup>③</sup>

锡章君的专著，不能说没有薄弱环节，关于“经验与理性”的论述，个别地方说服力尚嫌不够，但就整体而论，它是一部理性色彩很浓的书，是一部厚实的力著。读后它启发我思考许多问题。作者文字如行云流水，没有堆砌新名词、故作艰深之语。书中多有精到之见，下列一段话，尤促我自省：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将人的现代化提高

---

① 《鲁迅全集》第6卷2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鲁迅全集》第13卷683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359页。

到全民族的最重要的日程上来。一是要勇于吸收别人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一是要把民族“古已有之”但未真正实现过的合于现代化的特点给予创造性的继承和转化，要使人真正从传统人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人。

诚然，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甚至是非常痛苦的过程。向传统告别（并非断绝关系）在心理上、情感上有着难以忍受的苦痛，这是人性中的一种自然状态。但是，任何转变都是一种痛苦，与其痛苦地苟活不如痛苦地另求新路，应是人该具备的一种健康心态。“现代”和“传统”并非势不两立，“现代”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完结和毁灭，它恰好是对“传统”的一种合理的创造性延伸。

是的，可以断言：没有大批现代化的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那只是空想。同时，毋庸讳言，我国国民的文化修养（大文化概念上的“文化”）确实还相当落后，不警醒、不承认只能是自甘落后。明智的读者，定会和本书著者共鸣，努力使自己实现“现代化”。

1995. 6. 17 于武汉大学

# 要 目

## 第一章 悲剧命运下的选择 [1]

古老神话的幻灭——文化的衰落——创造力、凝聚力、包容力、抵抗力的减退——人性萎顿与社会发展的阻抗——悲剧的顶点

性灵在刀光火色中苏醒——改革的三部曲——“立人”与思想革命——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为人生的历史主题——选择：重建国民性

## 第二章 生存与发展 [43]

生存的意义——存在与超越——求生存为已任的传统人性功能——“顺其自然”的妥协——低层次的简单生活理想——“均平”观念——“节用”原则——求生意志的强烈——好死不如赖活的人性根据——实利主义与理想盲视——循环的生命圈

变顺应为挑战——征服自然的要求——抵抗力的意义——走向人道的必由之路——理想人性的起点与终点：生存与发展进化——人性发展观的确立——革命的手段——求生意志向求胜意志的转化——理想人性的构成

## 第三章 客体与主体 [85]

唯客观决定人性结构的特征——不可逾越的人性阶段

——中世纪中国与欧洲人性结构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人性结构的成因——自然力量——经济的客观意志——专制的力量——伦理成为绝对命令——天命的神圣光环——原始同一性的遗留——主体性的丧失——屈原、李白、孙悟空命运新解——奴性与依附型人格——奴隶的类型及其特点——“被动者形象群”的意义——拔掉奴根的战斗呐喊

主体解放乃人性解放的必然标志——自由的实质——独立自主的基础——主观意志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战士人格的提倡与培养——“摩罗派”诗人的影响——韧性的作用——抒情之意省——浪漫洪流的真正形成

#### 第四章 群体与个体 [139]

个体在传统社会中的微不足道——群体本位的形成机制——三道群体同心圆——虚构集体的桎梏——“公本位”观念——“立公弃私”的理想——“无我”的人格境界——一个怪圈的产生：公私两相忘——个体独立存在受到粗暴否定

个体解放的旗帜终于升起——全体独立的人性意义——“任个人而排众数”——自我的扩张与膨胀——个人被抬到宇宙之上——利己：爱他的起点——个人与群体的真实统一——爱的理想——新规范的拟定

#### 第五章 经验与理性 [186]

经验在古代的崇高地位——过去本位——“法先王”的神话——“人惟求旧”——祖宗崇拜——老人统治——传统的全面尊重与服从——复古主义源远流长——经验自我人格的成型——科学精神的失落——直观思维方式的发达

理性的力量——怀疑精神的提倡——批判意识的增长——批判的双重性：批判对象与自我批判——自由创造的前提——散文化倾向与理性化：文学的自觉——“现实——未来”观的确立——科学为人性之光——走向智慧的生存

## 第六章 静态与动态 [231]

静本位观：传统人性的平衡器——禁欲主义——植物性生存——知足长乐忍辱负重——坚忍主义——与世无争的生存——无为而治以柔克刚——对异端的排斥——“中

个体在传统社会中的微不足道——群体本位的形成机制——三道群体同心圆——虚构集体的桎梏——“公本位”观念——“立公弃私”的理想——“无我”的人格境界——一个怪圈的产生：公私两相忘——个体独立存在受到粗暴否定

个体解放的旗帜终于升起——全体独立的人性意义——“任个人而排众数”——自我的扩张与膨胀——个人被抬到宇宙之上——利己：爱他的起点——个人与群体的真实统一——爱的理想——新规范的拟定

## 第五章 经验与理性 [186]

经验在古代的崇高地位——过去本位——“法先王”的神话——“人惟求旧”——祖宗崇拜——老人统治——传统的全面尊重与服从——复古主义源远流长——经验自我人格的成型——科学精神的失落——直观思维方式的发达

气势的光大——“拿来主义”的正确方式——人类意识的建立——真诚与宽容——“管闲事”与互助性

## 第八章 超越的断层与新的弥合 [309]

思想的暗流与古怪的幽灵——“五四”精神与今天的断层而非今天与传统文化的断层——政治斗争的影响——战争的干扰——强大的文化惰性——探索者、实践者自身的局限——“新时期”弥合断层的努力——现代文明的第二次冲击波——“文化寻根”蔚然成风——人的现代化与理想人性的思想联系——殊途同归——步履维艰但前途无限——一个永恒的课题

## 第 一 章

# 悲剧命运下的选择

---

### 1

每一种文明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过去。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以其悠久的文明史和为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占据着无容否定的历史地位，我们的祖先，以其聪明智慧的创造力，谱写下令人赞叹不已的文明乐章；我们的前辈，通过坚韧不拔的毅力，创造了无数文明的甘露，至今使人类还蒙受着他们的滋润。

这是值得人们，尤其是炎黄子孙们骄傲的资本！历史把一个巨大的事实存在推到现代人的面前，谁能把它抹杀尽净呢！

于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英雄们，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编织了五彩缤纷的美丽桂冠，在历史的巨

大身躯上，罩上了神圣而夺目的灵光。经过文化英雄们的精心营造，一个巨大的精神实体——天朝圣国的不可侵夺的神话——形成了。她是信仰，她是偶像，她是每一个子孙后代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母。

这不是先辈们随心所欲捏造出的天方夜谭，事实的存在，使这一神话至今仍保留着某种不可企及的魅力。

打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四千年的文明进程；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的发明，证明我们有着无穷的创造力；

我们有数万万的人口，有着世界上他民族无可伦比的生命数，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民族生命力的顽强，舍此还有什么解释？

我们在历史上，以其文明的巨大包容力，成功地同化了无数落后的文明，这又是使人神往的魅力所在，也是“精神文明天下第一”神话形成的客观基础。

当人们不断地把这些事实，通过种种手段，一代一代地传播给后世之后，“这种印象传给一个守成的后代，就把一个使人类赞叹的事实夸张成为一种不可抵御的神话”。<sup>①</sup>

事实的神话令人可钦可佩。然而，事实的神话如不能持久地保持，且渐渐变为一种纯属虚拟的幻想式的异想天开，那么，事实神话的幻灭也就指日可待了。如果历史的悠久不能

---

① 汤因比：《历史研究》下，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焕发出新的生命，反而成为沉重的生命负担；大一统不能成为进步的杠杆，反而成了保守的代名词；创造的才能及其成品不能化为实际的功能，仅仅构成人们沾沾自喜的心理上的平衡物；人口众多不是让人成为实践进步的动力，而是把人驯服成简单维持传统与现实的生命对应物；精神文明不能转化为创造物质文明的主体动力，而不过是养成丧失灵明和活力的碌碌无为之辈，那么，英雄的文明就已经走向了悲剧的末路。无论人们绞尽脑汁，企图保持那过去的神话，但努力的结果，仍然不过是将过去的神话化为一种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把它变成人们在精神上寻求安慰和胜利的土壤及温床。事实的神话一旦成为朦胧的背景，又仅仅以记忆的形式支撑着人们对英雄时代的崇敬，于是，虚幻的神话就取代了事实的神话，梦境成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长此以往，在新的破坏性事实的教训下，古老的神话的真正命运，只能归于幻灭。就中华文明而言，自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危机，到了明清之际，古老的英雄神话在内部日益衰朽的机体和外力的作用下，终于走向了幻灭。

## 2

导致神话破灭的因素不外乎内因和外因，固有文化传统生命机体的衰落，几千年建造的人性结构的萎顿和列强的鸦片大炮便是两种最为直接的神话幻灭剂。

按照施本格勒的说法，每一种文明如果比拟为生命有机体的生死循环，都有自己朝气蓬勃的青年期，强健有力的壮年期和渐趋崩溃没落的老朽期。以此推之，在先秦时代，正

是我们民族文化生长的青年期。那个时候，思想活跃，百家争鸣，展现出的是生命的冲动和较为健康的文化心态。自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到盛唐时代，从文化的角度看，其生命不愧为壮年期。强健有力，气势宏大，疆域的扩展，与外部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显示了中华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汉唐气势，正是在这一个时期，文化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打此以后，虽然历代都有新的因素贡献于世，也出现过“中兴”“盛世”的局面，但往往是昙花一现，只不过是古老文明衰落前的回光返照，而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近代，就达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了。

早在五十多年前，胡适曾以文学的笔法，描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形象，虽然他塑造的这个形象不足以涵盖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但在整体上，不得不承认这一形象的生动性和真实性。胡适把中华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幕英雄悲剧，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既令人高兴也让人扼腕，有时令人伤心掉泪绝望，有时也给人光明希望安慰。英雄的历程，犹如姜子牙三十六路伐西岐，平了一路又来一路；又似唐三藏西天取经，脱离一难又遭一难。因其“继续不断奋斗，所以是一篇英雄剧，磨难太多，失败太惨，所以是一篇悲剧”。这一幕中华历史的英雄悲剧，除开开篇，胡适认为，有几幕大戏是中国历史的重场戏。第一幕，从商周始到秦始皇建立统一王朝止，他称为“老英雄建立大帝国”。这一时期，从周文化对北狄南蛮的同化，到儒家阶层作为新兴力量的崛起，说明了内在的活力存在。第二幕，上演的是汉至隋唐前的活剧。用胡适的话说，这是一个“有为”的时期，但根基未稳，而魔王却告来临：夷狄匈奴、鲜卑的威胁，形成南北朝的偏安之

局；而佛教的进入，对固有的本体文化，形成了南北夹击的形势。中国文化经两个魔鬼的侵犯，“野蛮化”和“非人化”了。因此，这一幕剧便题名为“老英雄受困两魔王”。到了隋唐，“老英雄死里逃生”，野蛮的北方民族终被同化，人的生活得以建立，人的文化走向繁盛。而“禅宗”的出现，宗教发生了革命，以佛攻佛，以佛改佛，非人现象得到纠正。一言以蔽之，文化在此时具有包容性，富有弹性的张力。这就是第三幕。然而好景不能常在，北方的契丹、女真、金、元相继南进，“这时老英雄已经是受了伤，——精神上受了伤（可说是中了精神上的鸦片毒——佛），所以此时是裹创奋斗”几经奋战，宋帝国终于建立，但到了蒙古的兴起，“老英雄已精疲力竭，实在不能抵抗了”；第四幕戏就以元朝的建立而鸣锣谢幕。到了明朝和清朝，病情日益加重，机体已趋腐朽，故胡适之称这第五幕戏为“老英雄病中困斗”。在此时，虽有一些建树，但已经抛弃了“有为”和“向外”的生气，结果是“无为”“无生气”，三寸小脚遍及天下，八股文章甚嚣尘上，再加上鸦片，“老英雄内外都得病症”；清居天下二百余年，东北和西南的开辟，文化似乎有所扩展，但“人的学术”的建设，实在已是垂暮之年，力不从心。胡适只好一叹了之：“老英雄已经是老了，病了！”①

平心而论，胡适描述的英雄悲剧实质上也就是文化的悲剧。只不过，他是印象式的描述，而最大的缺陷，在于把文化衰落的原因仅仅归于外族的侵入和佛学的影响，对本体文

---

① 胡适：《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51—3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化的内在生命机制中，早已隐伏下来的，后经历代逐渐扩大的负面的因素，未能给予充分地检讨。

我们不是文化宿命论者。我们认为任何文明或文化并非注定要衰老死亡。中华文明在封建社会后期之所以日薄西山，并不是受宿命论支配产生的结果，而是整个文化模式的积极性特质受到抑制、消极性特质得到膨胀的产物，归根到底，则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他走向困境和衰落的命运。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统一国家文明衰落的原因曾有过极富启发性的解释。诚然，文明的衰落与国家的统一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文明史的过程又说明，凡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直到今天，确实存在着阻碍文明进步的一些消极制约因素。统一能保证国家民族的安定，但统之过死，就会板滞和僵硬，就会造成活力的减退；统得过紧，把个人和地方的相对独立性完全取消，从而使个人和地方迫于专制，以外在的服从来掩饰内在的分裂与独立，结果形成内部的凝聚力的消减，为文明的衰落和社会的解体积聚了内在的瓦解力。如果抛弃汤因比的纯文化的观点，联系到阶级的对立事实及其产生的反叛的力量，那么，汤因比对文明衰落作出的三点实质性结论仍然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衰落有三个相关的本质因素起着主要作用。首先是“少数创造者不再有创造的力量”，原先以创造者身份出现的少数人变成了“统治者”；其次，“继之而来的是多数方面撤回了他们的支持和模仿”；再次，“其结果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社会的统一”。<sup>①</sup>我们便以此对中国

---

<sup>①</sup> 《历史研究》（中），第400页。